

让铁皮石斛“飞入寻常百姓家”

——记于都县退伍老兵、中药材种植户袁志庚

□记者刘庆元 通讯员郭洪福 文/图

年至古稀、家境不错的他,本可以垂钓遛鸟、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但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他并未选择悠闲的生活,而是投身岐黄之道,在草药香中“捣鼓”闯荡。他采用原生态方式,创新铁皮石斛仿野生栽植,并获得成功。事迹经媒体报道后,赢得众多粉丝点赞。他便是于都县罗坳镇孟口村村民、中药材种植户袁志庚。

从小热爱中医药

“这个茎秆可用来炖汤,制作药膳,能增强免疫力,安神美容,养生保健功效好。”近日,袁志庚老人带着村民,兴冲冲来到自家的铁皮石斛栽植基地参观。茂林修竹间,一丛丛绿油油的铁皮石斛枝繁叶茂,拔节生长。袁志庚一边手持剪刀,从容采摘成熟的石斛茎秆,一边与身旁的村民攀谈起来。“因为铁皮石斛的药用、药膳价值高,所以民间有九大仙草之首的说法。”据老人介绍,这一批以活竹竹腔为载体的铁皮石斛,今年4月栽植,6月开花,7月下旬开始结果。预示着自创的这种仿野生栽植方式落地见效。

然而,袁志庚对铁皮石斛仿野生栽植的探索之旅,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

“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几株草配合在一起,就能治病救人,太神奇了。这几株草或小灌木在常人眼中往往只是草,懂行的人眼中便是宝。”幼年时期,袁志庚经常跟着爷爷上山采药、碾药、熬制药膏、泡药酒,耳濡目染,少年袁志庚对传统中医药渐生热爱。1969年至1973年,袁志庚在福建特警部队服役。其间,袁志庚受一名老军医点拨,更加坚定了学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信念与热情。鉴于在中药材种植领域的建树和特长,2018年,袁志庚被推举为于都县中医药研究学会副会长。平日里,袁志庚自费订阅中医药报刊,关注中医药发展政策信息,同时在家门口种满了诸如杜仲、骨碎补、石菖蒲、艾草、紫苏、薄荷等中药材,他还收藏了一些常用中草药,以备家人及邻里不时之需。

活竹上种出铁皮石斛

石斛是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统称,全球约有1500种,我国有76种,其中铁皮石斛因功效突出,被称为“石斛中的极品”。“石斛性微寒、味甘,归胃、肾经,具有滋阴清热、益胃生津、补肾益精的功效。石斛的茎秆是主要食用和药用部分,可煲汤、泡茶泡酒或打粉、制作膏丸服用。因石斛其性微寒,所以脾胃虚寒、腹泻者不宜过量服用。总之,石斛的核心价值在于滋阴生津,适合阴虚体质人群调理使用。”于都县祁禄山镇卫生院院长、主治中医师肖二发介绍道。

袁志庚最初接触到铁皮石斛栽植,源自早年收看一档名叫“本草流芳”的电视公益栏目,后来又从报纸上得知有温州专业户到陕西开展铁皮石斛种植。这让老人怦然心动,萌发种植的念头。2024年4月,袁志庚长途跋涉,远赴浙江温州雁荡山,实地考察铁皮石斛种植情况。随后购入100余株铁皮石斛种苗试种。

虽然仿野生栽植没有现成的参照,但袁志庚反复研读《林草中药材仿野生栽培通则》后,摒弃人工温室大棚栽植的思路,决定按照原生态的模式栽种。此前,他从《农民日报》一篇报道上了解到有人将铁皮石斛捆绑在树干、活竹节上栽植。细心的他很快发现:这种模式有



袁志庚在竹林中查看铁皮石斛的长势。

一个缺陷,即需要经常喷水,费时费工很麻烦,于是,他联想到竹筒酒的生产工艺,顿时就来了灵感:何不参考竹筒酒的做法呢?豁然开朗的袁志庚很快找到一片竹林,在成年活竹腔开孔,填上碎石、木屑等基质料,利用竹腔溢出的竹液为养分,产生光合作用,最大限度提升铁皮石斛栽植的“野味”。“国家明确规定,野生石斛属植物,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禁止采集和销售,足见野生品类的珍贵、珍稀。”谈到铁皮石斛仿野生栽培方式的探索创新,袁志庚瞬间打开了话匣子,“因为铁皮石斛是气生根,这种以竹腔为载体的栽植模式不打药、不施肥,也不用浇水,最贴近野生石斛的品质效果……”

该县林业局产业发展股股长、高级工程师严海生介绍,这种在活竹上种出的铁皮石斛当年栽植当年开花结果,意味着以活竹腔为载体的铁皮石斛栽植试验获得成功,技术基本稳定成型,具有较大的原创价值。

期待石斛“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介绍,于都县林下空地多,道地药材资源丰富,共有天然药用植物148科407属634种,其中包括29种重点药用植物。受益于政策驱动、辐射带动,该县像袁志庚这样利用林下空地投身中药材种植的个体农户或合作社日渐增加,全县林地利用率和农户收入随之提高。目前,全县建成规模以上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10个,产业总收益达到1.2亿元。如今,中药材种植加工渐成县城医药健康主导产业,乡村产业振兴提质的“良药良方”。

经过实践探索,袁志庚收获到铁皮石斛仿野生栽植的一整套经验,从100多株到600多株,门前屋后,果园林地,目之所及都是欣欣向荣的仙草铁皮石斛。不久前,袁志庚还应邀前往广州传授铁皮石斛栽植技术,引导当地村民在龙眼、荔枝树上栽植铁皮石斛,帮助村民实现“一树多得”。

现年76岁的袁志庚依然闲不住,他正计划着将自己摸索出的铁皮石斛仿野生栽植方式加以完善,申报栽植技术专利和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通



袁志庚利用活竹为载体种植的铁皮石斛长势喜人。



袁志庚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家坚持学习。

过交流推广,让“野蛮生长”的铁皮石斛这一仙草“飞入寻常百姓家”,共建共享带动村民闯出一条新型产业发展之路,身体力行将中医药传统文化传承好、创新好、发展好。邻居曾小燕说,袁志庚这种退伍不褪色、老而弥坚不服输、执着进取不退缩的精气神,正日益感染熏陶着当地年轻一代。

据了解,2019年,国家将铁皮石斛纳入药食同源清单。伴随人们对健康生活、日常保健的不断追求,铁皮石斛行业也将衍生巨大的市场需求。“到那时候,我可以提供种苗和栽植技术,也可以回收仿野生栽植的铁皮石斛。”谈到项目发展构想,袁志庚雄心壮志地描绘着铁皮石斛产业的“新丰景”。

世相放谈

近日在一个景区看到几幅书法石刻,功力很好,但遗憾的是不见署名。同一景区的古代书法碑刻,则不仅署了名,也写明了职务。经过了解,这些未署名碑刻的作者,都是30年前当地的名流,不仅书法精湛,部分人还曾担任要职。可以想见,再过更长的时间,那些未署名碑刻的作者,必将湮没在时代洪流;对景区而言,亦是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这种不自信,不是作品水平不高,而是作者觉得“名家”远在天边,难于企及;部分人潜意识里认为“小地方难出大家”,乃至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这些无名碑刻,如同失语的星辰,默默伫立于景区一隅,诉说着一段被隐匿的地方文化传奇。这种文化现象,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我们对地方文化认知的深层困境——那种根植于等级观念的文化不自信,那种忽视基层文化源泉的短视。真正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是精英阶层的独白,而应如屈原所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清澈与浑浊皆具价值。中华文化的沧浪之水,其源头活水正奔涌在最广阔的基层大地之上。

地方文化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区域最鲜活的时代印记,承载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记忆与集体情感。每一支传唱于田埂间的山歌,每一件出自民间艺人之手的工艺品,每一处留存乡野的建筑遗迹,都是时代在地方留下的文化烙印。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记忆不仅是个体心理功能,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地方文化正是这种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譬如,陕北的信天游吟唱着黄土高原的苍凉与坚韧,江南的评弹演绎着水乡的温婉与灵秀,这些艺术形式不仅展现地方美学特色,更记录着当地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那些未署名的书法碑刻,虽然艺术水准不凡,却因缺乏明确的时代署名而失去了与特定历史语境的血肉联系。正是这类时代信息的缺失,导致文化记忆链的断裂,使后人难以完全解读其中的文化密码,最终导致地方文化记忆的消逝与历史连续性的中断。

地方文化作为时代印记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真实性上。与经过精心雕琢的官方文化不同,地方文化往往保持着原生态的鲜活质感。无论是敦煌壁画中的民俗场景《诗经·国风》里的劳动吟唱,还是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的市井记载,无不为我们理解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中,地方文化属于“小传统”,却恰恰因其贴近日常生活而保有文化原真性。那些景区中未署名的碑刻,如果能够保留作者信息,不仅是对创作者个人的尊重,更是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和文化风貌留下准确注脚。可惜的是,这种源于自我怀疑和外界轻视的“匿名化”处理,使这些作品成了无根浮萍,难以在后人的文化考证中找到其准确定位。

然而,地方文化独特价值的彰显,亟需社会为其创设充分的展示机会和平台,这是培育文化自信的关键路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强调,公民在一个开放空间中通过理性对话形成舆论和文化认同。对于地方文化而言,这个公共领域就是其获得可见性、被认可、被传播的重要舞台。景区碑刻匿名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平台机制的失效——地方才俊的作品虽获展示,却因署名权的缺失而被剥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其创作主体性也在无形中被消解。

历史告诉我们,许多今天被我们奉为经典的文化遗产,最初都源自地方性、民间性的创作。《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本是各地民歌,通过周代采诗官的收集整理而登上大雅之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源于古代画工的匠心独运,因敦煌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这些文化形态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打动后人,正是因为有了适当的保存与展示机制。

在当代,我们更需要通过多重手段为地方文化搭建展示平台:文化政策上应向地方倾斜,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地方文化项目;现代传媒应赋能地方文化传播,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地方文化资源库;民间节庆应活化传统,让地方文化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的表达形式;教育体系应融入地方性知识,使青少年从小建立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只有通过这些全方位努力,才能让每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声音都有机会加入中华文化的宏大合唱。

保持地方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使其在现代化浪潮中不致湮没,是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冯骥才曾呼吁,中华民族最深的根实际上是在村落里,而不是在城市中,要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和传统村落。然而,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地方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正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地方热衷于建造仿古街区、引入标准化文旅模式,却在无形中消磨了本土文化的真实性;一些非遗因传承乏人而濒临灭绝,如同无声熄灭的星火。

要保持地方文化生命力,首要之举是进行系统性挖掘、整理与研究,借助数字化手段建立数字化档案,为文化存续留下火种。更重要的是“活态传承”,让文化回归生活现场,例如,广西南宁的民歌湖群众歌圩活动,让山歌对唱重新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又如浙江龙泉青瓷烧制技艺,通过“非遗进校园”与创新设计,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唯有当文化在地脉与人脉中持续流动、生长,自信才能真正植根于社区肌理与个体心灵。

那些未被署名的碑刻,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我们曾经的文化等级观念与自信缺失。而要真正树立起坚实而磅礴的文化自信,就必须实现认知范式的根本转变:从仰望“高大上”的迷思,转向俯身倾听大地深处的回响;从对“大传统”的过度推崇,转向对无数“小传统”的珍视与发掘。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信”,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这种自觉,首先源于对脚下土地生长出的文化价值的深切认同与自豪。

让每一首童谣都被铭记,让每一支山歌都拥有回声,让每一位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都能署名留痕——当无数流浪般的基层文化自信交汇奔涌之时,便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江河浩荡、长流不息之日。我们终将领悟,文化自信不在远方的缥缈峰顶,而在每一个乡村野老的讴吟之中,在每一处大地褶皱的文化肌理之内,等待被唤醒、被尊重、被传唱。地方文化作为时代的印记,不仅记录着过去,也启示着未来——唯有扎根基层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支撑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之梦。

野老讴吟自信长

□凌利华

孝心守护创造生命奇迹

——记赣州市文明家庭伍明明家庭

□记者钟清兰

9月4日清晨,赣州经开区三江镇的伍明明像过去多年里的每一个早晨一样,细心地为母亲梳洗整理,喂母亲吃过早饭后,熟练地背起她,一步一步走向自家经营的五金店。

这是一条伍明明再熟悉不过的路,也是一个儿子用责任与孝心铺就的长路。他已悉心照顾患病的母亲20余年。

1996年,一场车祸夺走了伍明明父亲的生命。那时他仅14岁,哥哥伍学辉15岁。母亲罗玉兰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为减轻家庭负担,兄弟俩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眼看生活正要好转,厄运再次降临——2004年4月,母亲突发中风,被确诊为同心圆硬化后遗症,术后陷入长期昏迷。

重症监护室每日上千元的开销,很

快耗尽了兄弟俩所有积蓄,还欠下数万元外债。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劝他们放弃,但他们始终坚持:“只要母亲还有一口气,我们就绝不放弃。”也许是孝心感动了上天,昏迷半年多后,母亲奇迹般地苏醒了。

2005年春节前夕,兄弟俩将母亲从医院接回老家过年。正月初二这天,母亲突然病发,情急之下,伍明明背起母亲一路小跑,来到离家约1.5公里的路边,拦下一辆路过的小货车。好司机紧急将其母亲送到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母亲又一次摆脱了死神。事后,医生感慨道,要是再晚几分钟送到就没救了。

经过多次抢救,母亲挽回了生命,却瘫痪在床,失去了自理能力。她对尿不湿过敏,也不能垫隔尿垫,一天大小便失禁

多达十几次。兄弟俩毫无怨言,轮流为母亲清洗身体、更换衣物,不分昼夜地守护在床前。

在兄弟俩的悉心照顾下,母亲的身体渐渐好转,几年后已能在搀扶下坐起,甚至可以简单表达自己的想法。为兼顾生计与尽孝,兄弟俩决定一人留守照顾,一人外出打工,生活终于重现微光。兄弟俩成家后,本以为终于迎来曙光,厄运却又一次降临——2015年,哥哥伍学辉被确诊胆囊癌,治疗半年后不幸离世。

哥哥的去世让母亲深受打击,性格也变得喜怒无常,越发依赖伍明明。哪怕一时看不见儿子,都会大哭大闹。为时刻陪伴母亲,伍明明买了一辆二手小货车,每天载着母亲上班。

伍明明回忆说,母亲心情好的时候,

他可以安心上班,遇上心情不好,就会被百般“刁难”。母亲对停车位的要求也极高,周边要干净、人少,夏天有阴凉,冬天有太阳。伍明明一一满足母亲的要求,无论多忙,每隔2个小时他就回到车上帮母亲喝水、解手、擦洗,或是背她到车下走动。在他的悉心照顾下,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好。

2018年,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不宜长时间坐在车上,伍明明辞去家具厂工作,在自家门口开了一家五金店。从此,他一边经营小店,一边照顾母亲,出门为客户服务时也将母亲带在身边。

家庭经历几次变故,生活确实艰难,但伍明明却从未低头。他说:“日子会好起来的,有母亲在,就是家。”

伍明明的感人故事,在社会上广为传颂,邻居们都对他竖起大拇指。他被评为“中国好人”,他的家庭被评为“赣州市文明家庭”。

